

第二章 明代江南的遊觀活動



中國自古以來對遊觀一般採取嚴肅的態度，加上冶遊多予人負面感覺，遊觀往往被視為不正經之事。而明初政府對於人口流動的嚴密控制，四民各有定業，禁止遊惰，百姓多為己身的職業所束縛，更與遊觀無緣。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交通的便利以及可供自己支配的業餘時間增多，遊觀開始蔚為風氣。遊觀活動在中晚明普及化、大眾化，從「不正經」的事變成「名高」之事，不僅士人雅好山水，多於閒暇時光結伴遊歷名山大川，一般百姓更是配合著歲時節令，外出攬勝，參與節慶廟會活動，藉此休憩身心，婦女也邁出閨閣，踏青、觀競渡、出入燈市。士人以探究山水之美為重，為避遊人，多往深山幽靜之處；一般百姓則往往藉掃墓、燒香禮佛之名，行遊觀之實，多以寺觀名刹及郊野為主進行遊覽，呈現出不同社會階層遊觀活動的顯著差異。本章將分別鋪陳士人及一般百姓、婦女的遊觀活動，期望藉此勾勒出明人好遊的具體形象，以作為本文討論的基礎。

第一節 士人遊觀

在明代中後期遊觀風氣興盛的情況之中，士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遊觀活動不僅限於菁英階層的官員和士大夫，更擴及到社會大眾，

士人在遊觀活動逐漸普及化的潮流中，也發展出具有特色的士人遊觀形式。如觀覽山水之時，多往幽靜之處，認為如此才能夠與一般民眾有所區別，¹因此與一般市井百姓多選擇歲時節令之時前往名勝遊賞的情況大相逕庭，即便前往名山大川等勝地遊賞，也多以閒適明志，強調己身遊賞的特殊性。²士人在閒暇之時專程前往風光明媚處，恣意遨遊，名山勝水、寺院古刹，都是遊賞的重點。在靜態的遊觀上，士人選擇遊賞風景優美、交通便利的名山勝水，例如在春暖花開之際，前往群花綻放處遊賞，或在園林中賞花攬勝，享受不同於天然風光的人工造景，對於文士而言，也是雅事一樁。在動態的遊觀上，由於好奇險的探險風氣瀰漫於士人之間，崇山峻嶺等遊人罕至之處，更是文人雅士競相前往以窮耳目之樂的絕佳去處，在文集中多可見「陟危履峻」³之描寫。而氣力不殆，無從攀涉以近絕景者，也能依賴其他文士所撰之遊記，所繪之丹青，遙想景致，臥遊其間。本文前章已詳述明代士人好遊心態的轉折及特殊性，本節主要偏重於描繪文人攬勝的各種形式，以見文人寓情山水的多種面貌。

一、閒遊遠遊

有別於前代士人欣賞山水美景的保守拘謹，明代士人以積極的態度坦言好遊，並利用公餘或閒暇之時，前往各地名山勝水恣意賞遊，對於明代文士而言，以遊覽「屏斥憤鬱之抱，寄情於巖壑煙雲之間」，⁴是

¹ 明·陶望齡，《陶文簡公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集部 114 冊，卷六，〈也足亭記〉，頁 61a。

² 明·金善，《金文靖公集》，收入沈雲龍選輯，《明人文集叢刊》（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1：3，卷八，頁 639。

³ 明·張維機，《清署小草》（台北：漢學研究中心藏日本內閣文庫景照本，明崇禎四年刊本），卷六，〈西湖記遊記〉，頁 17。

⁴ 明·張佳胤，《張居來先生集》（台北：漢學研究中心藏日本內閣文庫景照本，明萬

寫意適性的大事，因此位於城郊、城中，交通方便的勝景，便成為遊觀的好去處，虎丘、西湖等江南名勝，除了吸引平民百姓前往賞遊外，也是明代士人生平必遊之處。更由於明代文士喜遊崇山峻嶺，以奇險相高，故天目、天都等江南境內高山，也是文士出外遊觀之時的重要必經之地，袁宏道（1568-1610）便曾提到自己與朋友顧氏閒談之時，顧氏表達自己南歸時賞遊的希望，略述心中企盼前往的勝地，以為若能夠覓得風景優美之處，願意結草蘆以終老，袁宏道記述：

僕今年乞差南歸，往返可得一歲，將以七月了虎丘，八月了西湖，霜後渡洞庭，拾橙橘，來春探天目、天都諸峰，遊屐所至，倘得一二佳山水處，願得卜地一居，為他年棲隱之所。然以僕觀之洞庭山水，木石俱勝，將終老於莫釐飄渺之間矣。⁵

虎丘、西湖、洞庭、天目、天都等景點都在顧氏賞遊的計畫之中，他所認為的必遊之處，即便不能代表所有文士的想法，也可以推知西湖、虎丘、洞庭等車馬易達之處，與天都、天目等崇山峻嶺，在士人的眼中同屬於必遊的勝景。

生活中處處都是美景，對於喜好游賞的文士而言，一年四季的各個時分，都有特殊的風景值得賞玩。春天風和日麗，正是出遊的好時節，高濂在《遵生八箋》中便提到春天氣候宜人，最適合外出遊賞：

春天氣暖則襟韻舒，日盡則煙景媚。百鳥和鳴，千花競發。田畷舉趾於南畝，遊人聯轡于東郊。風光之豔，遊賞之娛，此為最矣。

6

曆二十二年序刊本），卷三十九，〈遊貴縣南山巖記〉，頁6。

⁵ 明·袁宏道，《袁中郎全集》，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出版公司，1997），集部174冊，卷一，〈顧升伯太史別敘〉，頁15b。

⁶ 明·高濂，《遵生八箋》（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9），頁352。

夏天則雖然氣候熾熱，但「盛夏之月，芙蓉十里如錦，香風芳馥」，能夠高坐於船舫之上，悠閒的賞花飲酒，亦是人生一大享受。⁷張瀚（1510-1593）在《松窗夢語》中便提及盛夏泛舟西湖的樂趣：

然西湖夏月，荷葉亭亭水上，如翠蓋紅妝，豔麗無比，香芬動人。即盛夏之候，泛舟湖畔，停泊垂蔭，清風徐來，頓忘炎燠。余嘗經齊、秦之境，亦多芙蕖，安得畫舫搖曳，遊人欣賞也。⁸

秋高氣爽之際也適合出遊，虎丘終歲遊人不斷，但以中秋夜最具韻致，除以景致取勝外，中秋時分月色正美，氣候爽適也是賞遊關鍵，如張瀚便提到「中秋泛湖，招邀良朋勝友，舉觴把玩，甚暢幽懷。夜涼人靜，月色湖光，上下澄澈如洗。當此之時，擊楫浩歌，心神飛越，曾不知天之高、地之下，悠然樂而忘人世知」，中秋之夜，夜涼人靜，泛舟於倒映著滿月的湖上，引吭高歌，任憑心神飛越於天地之間，可以忘卻人世的煩憂。⁹而在重陽節前後，天氣漸涼，是登山活動的好時辰。自古以來，文人雅士就喜愛重九登高，因此描寫重陽登高遠眺、欣賞山河美景的詩文不少。冬天雖然霜雪刺骨，但張岱（1597-1685）仍在冰天雪地之時，獨往湖心亭看雪，感受蕭瑟的人生韻致：

崇禎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鳥聲俱絕。是日更定矣，餘拿一小舟，擁毳衣爐火，獨往湖心亭看雪。霧凇沆砀，天與雲、與山、與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長堤一痕，湖心亭一點，與余舟一芥，舟中人兩三粒而已。¹⁰

⁷ 明·袁中道，《珂雪齋前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集部 729 冊，卷十一，〈西山十記·記一〉，頁 15a。

⁸ 明·張瀚，《松窗夢語》（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七，頁 127。

⁹ 明·張瀚，《松窗夢語》，卷七，〈時序記〉，頁 138。

¹⁰ 明·張岱，《陶庵夢憶》（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卷三，〈湖心亭看雪〉，

在一片白色世界之中，雖只有張岱及覆蓋白雪的長堤、湖心亭，但其蕭索之美，卻也別具風味，除了欣賞到有別於其他時節的美景外，更塑造了特屬於文士的清高之遊。由此觀之，一年四季俱是可以出遊的良機，不同時節不同美景，都有其可看之處。

天下美景眾多，蘇州的虎丘、杭州的西湖尤為人所知，雅好山水的文士，更是必遊虎丘、西湖。虎丘位於蘇州城西北，因相傳是 2500 多年前吳王闔閭生前遊樂、死後埋葬的地方，加上歷代名士的題詠和民間傳說的渲染，讓虎丘的一亭一閣、一水一石，都成了石跡名勝，有「吳中第一名勝」之稱。清代話本《豆棚閒話》中便提到「虎丘乃天下名山，客商仕宦聚集之處，往來遊玩作耍的人多」，¹¹虎丘之所以成為文人的必遊之處，在於虎丘地勢不高，且距離商業要地閶門甚近（七里），¹²交通往來非常方便，加上自古以來文人逸士的題詠讚美，例如宋代文豪蘇東坡（1036-1101）曾說：「到蘇州而不游虎丘，乃憾事也。」蘇軾以不遊虎丘為憾，可見虎丘自有他處不及之處。也因此讓文人士大夫存在著必遊虎丘的心念。即便袁宏道認為虎丘「無高巖邃壑」，¹³在風景上不能算是絕佳，但有著古今文人的背書，以及時代悠久的名勝古蹟，樹立了虎丘在文士心中無以撼動的地位。由於虎丘靠近都城，平民也能夠前往遊賞，因此遊人之多，甚至到了「蕭鼓樓船，無日無之」的景況。¹⁴楊應邵（1515-1588）則認為蘇州風景最佳處當屬虎丘，景致妙不可言：

頁 99。

¹¹ 清·艾衲居士編，《豆棚閒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十則〈虎丘山賈清客聯盟〉，頁 113。

¹² 清·徐崧、張大純編纂，《百城煙水》（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卷一，〈蘇州〉，頁 25。

¹³ 明·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卷八，〈虎丘〉，頁 1a-b。

¹⁴ 明·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卷八，〈虎丘〉，頁 1b。

(姑蘇)靈巖嶄屹秀聳，莫最於虎丘，濱接舟陸，中多小溪曲澗狹其間如抱月然，入其境不百步許，泉之冽，石之清，林木之斷齟不可狀。¹⁵

虎丘無論是早晨甚或是明月高掛的夜晚，都是「遊人往來，紛錯如織」的景象，而以中秋遊人最是盛大，袁宏道便有以下的記載：

每至是日，傾城闔戶，連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莫不靚粧麗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間，從千人石上至山門，櫛比如鱗。

¹⁶

中秋當日傾城遊虎丘，男女老少無一不至，袁中道（1570-1623）便認為「良辰佳節，都人士女，連轡接軫，綺羅從風，香汗飄雨，繁華鉅麗，亦一名勝」，¹⁷以人為景，觀人賞景也是一妙。但大致來說，對於希望藉遊賞暫拋世間煩憂的文士而言，士女傾城出遊，笙歌笑語，終夜不絕的景象，讓「丘壑化為酒場，穢雜可恨」，¹⁸使得只想享受山林僻靜者遊興頓減，煩躁難安。但為求遍覽虎丘景致，文士只好另覓時間前往遊賞，如李流芳（1575-1629）便喜歡在中秋節之前到達虎丘，享受遊人甚稀時的虎丘之美，李氏記稱：

初十日到郡，連夜遊虎丘，月色甚美，遊人尚稀，風亭月榭，閒以紅粉笙歌一兩隊點綴，亦不惡。然終不若山空人靜，獨往會心。

¹⁹

¹⁵ 明·楊應詔，《天遊山人集》，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別集110冊，卷十五，〈遊虎丘記〉，頁6。

¹⁶ 明·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卷八，〈虎丘〉，頁1a-b。

¹⁷ 明·袁中道，《珂雪齋前集》，卷十一，〈西山十記·記三〉，頁17a。

¹⁸ 明·李流芳，《檀園集》（台北：國家圖書館善本室藏，明崇禎二年謝三賓刊本），卷八，〈遊虎丘小記〉，頁348b-349a。

¹⁹ 明·李流芳，《檀園集》，卷八，〈遊虎丘小記〉，頁348b-349a。

在人煙稀少的夜晚，獨自前往遊賞，感受只有美景和心靈的互動，對於李流芳而言是最大的享受，相信對當時的許多文人也是心有戚戚焉。

文士聚集的著名景點，除了中秋時分的虎丘外，在蘇州更有六月廿四的荷花蕩之遊。荷花蕩在葑門外二里，每年以六月廿四日的「荷花生日」遊人最盛，袁宏道便曾提到當天「男女之集、燦爛之景，不可名狀」，以為蘇人遊冶應屬當日最盛。²⁰張岱在天啓二年（1622）六月二十四日經過蘇州之時，便見到士女傾城而出，齊聚於葑門外之荷花蕩，當日遊人之多，令人訝異：

蕩中以大船為經，小船為緯，遊冶子弟，輕舟鼓吹，往來如梭。舟中麗人，皆倩妝淡服，摩肩簇鳥，汗透重衫。²¹

終歲人跡稀少的荷花蕩，每年卻都有一日人聲鼎沸，遊人如織，即便因為人潮洶湧難以感受山水的美好，但與眾人齊聚歡歌的經驗，卻也是別有特色。張岱與袁中道相似，在遊賞虎丘及荷花蕩風景之時，不僅感受風景之美，更以人為景，以萬事萬物作為遊觀的目的物，充分增加遊觀的樂趣，這種萬物皆景的感受力，正是文人遊觀文化的特殊性。

杭州的西湖久負盛名，不只杭人以地近之便前往遊賞，更因為風景的佳美及歷代的有心經營，而成為著名的景點。²²由於西湖山光水色，風景絕佳，景致隨著四季變化而有所不同，春天的「蘇堤春曉」，夏季的「曲院風荷」，秋季的「平湖秋月」，冬季的「斷橋殘雪」，都令遊人

²⁰ 明·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卷八，〈荷花蕩〉，頁14a。

²¹ 明·張岱，《陶庵夢憶》，卷一，〈葑門荷宕〉，頁23。

²² 明·吳鼎，《過庭私錄》，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出版公司，1997）集部75冊，卷三，〈顏溪記〉，頁11a。

流連忘返，²³也因此每天都是是「士庶買舟出遊，聯翩絡繹，大小湖舫，遮布水苻，日無虛更」的景象。²⁴不分士庶皆遊西湖，不只是受到了西湖湖光山色的吸引，西湖附近的林逋²⁵故居等名勝也提供了遊賞的絕佳選擇。林逋（967-1028），字君復，是北宋錢塘（今浙江杭州）人，後人多稱他為和靖先生，由於他個性恬淡，不求名利，隱居於西湖孤山，有「梅妻鶴子」之頌。²⁶對於文人逸士來說，林逋所代表的是一種淡薄名利的文人情操，能夠到林和靖故居一遊，不但滿足了耳目之娛，更能夠以林氏精神自我標榜，提升自我形象。文人雅士遊湖，希望能夠享受泛遊湖上的幽靜，徐階便曾以「或偕友朋，具尊酒飲於湖上，醉而歌而釣而操舟，以漾於其中，自以為極樂」，²⁷來描寫己身暢遊西湖之感。不過因為遊人實在太多，在遊歷西湖之際，文士多認為應當選擇遊人較少之時出遊，尋求放浪丘壑，怡情山水的閒淡，²⁸或搖小舟看山間夕嵐，或於月夜登湖心亭，享受不被干擾的景致。²⁹對於同樣賞遊西湖的百姓，文士大多抱持著遊觀境界不同的觀感，在袁宏道的文字中可見一斑：

西湖最盛為春、為月，一日之盛，為朝煙、為夕嵐。今歲春雪甚盛，梅花為寒所勒，與杏桃相次開發，尤為奇觀。……然杭人遊湖，只午、未、申三時，其實湖光染翠之工，山嵐設色之妙，全在朝日始出，夕春未下，始極其濃媚。月景尤不可言，花態柳情，

²³ 古人嘗將西湖概括為十景：蘇堤春曉、曲院風荷、斷橋殘雪，柳浪聞鶯，花港觀魚，雷峰夕照，雙峰插雲，南屏晚鐘，三潭印月。

²⁴ 明·陳師，《禪寄筆談》，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出版公司，1997）子部 103 冊，卷七，頁 38b-39a。

²⁵ 明·王褒，《王養靜全集》（台北：漢學研究中心藏日本內閣文庫景照本，明萬曆十六年序刊本），卷一，〈梅軒記〉，頁 1。

²⁶ 林逋隱居於孤山梅嶺，由於經常放鶴湖中，以梅樹為伴，終生不婚不宦，因而有「梅妻鶴子」之稱，讚頌其閒適隱居之情。

²⁷ 明·徐階，《少湖先生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出版公司，1997）集部 80 冊，卷三，〈雨觀樓記〉，頁 16b-17a。

²⁸ 明·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卷二十二，〈孫心易〉，頁 5a。

²⁹ 明·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卷九，〈湖上雜敘〉，頁 1a-b。

山容水意，別是一種趣味，此樂留與山僧遊客受用，安可為俗士道哉。³⁰

袁氏以為只有文士瞭解在朝日始出，夕陽未下之時的西湖佳景，月色朦朧之美更非只在午間遊湖者所能理解。也正因為這種優越感及求異的心態，文士在暢遊西湖等遊人紛集的景點時，多選擇不同於一般遊人之遊觀時間，在遊觀的地點上則更積極地尋求具有特色的異境。³¹

然而對於文士而言，在遊賞西湖、虎丘等名勝時，除了自別於一般民眾，以標榜遊觀的品味外，袁宏道等文士則對於遊人紛集的情況，更多一層擔憂，他說：

……俗多奢少儉，競節好遊。……吳俗最重六月廿四日荷花蕩，中秋日虎丘，……虎丘諸山之遊，……在今則尺雪層冰、悲風苦雨，遊者不絕，何必二月始和哉。夫俗奢必蕩，蕩則窮，民泰必驕，驕則僭民窮，而僭亂從生焉。司道者不可無隱憂矣。³²

袁宏道指出，以往二月以後的天氣和暖，方適合出遊，如今即便是冰天雪地的時分仍是遊人不絕，所反映的是好遊之風盛行，然而好遊所帶來的鉅額花費，讓文士引以為憂。陳師亦同感憂心，他更提及僅是遊船等交通工具的花費，一個月就要萬兩銀子，在不分貧富爭相出遊的風氣下，有著「風俗安能淳樸，民安得不窮乎？」的悲嘆。³³對於文人來說，

³⁰ 明·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卷八，〈西湖二〉，頁 18a-b。

³¹ 李流芳出遊虎山，為避人潮，特別選了人少的日子前往，「是夜至虎山，月初出攜榼坐橋上小飲，湖山寥廓，風露浩然，真異境也。居人亦有來此遊者，三五成隊，或在山椒，或依水湄，從月中相望，錯落掩映，歌呼笑語，都疑人外，予數過此，愛其閒曠，知與月夕為宜，今始得果此緣」，見明·李流芳，《檀園集》，卷八，〈遊虎山橋小記〉，頁 350b-352a。

³² 明·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卷八，〈歲時紀異〉，頁 14b-16a。

³³ 明·陳師，《禪寄筆談》，卷七，頁 38b-39b。

出遊為適性之舉，也因此遍遊名勝是其想望，但在看待平民的遊賞時，卻往往以不同的價值標準看待，著實值得玩味。

由於文士大多以「縱觀四方，凡山水之地，名人之區，無不托足焉」³⁴為志，再加上拚命釣奇的想法，所以人煙罕至的崇山峻嶺、深洞幽壑都是文人必一探究竟的遊觀去處，江南鄰近地區著名的山嶽，最知名者當為太嶽（武當山）、鴈蕩（浙南）、匡廬（江西）等山嶽，³⁵明人的文集中屢屢可見以這些地方為主的遊記。文士好奇險，如黃仲昭（1435-1508）便以「探奇覽勝，以暢其懷，抱親賢友善，以博其見聞」³⁶，為生命中的一大樂事；袁宏道更有「戀軀惜命，何用遊山！且而與其死於床第，孰若死於一片冷石」³⁷的豪氣，相較於一般文士自言「余於泉石癖，蓋天性也。顧於泉，恨所出處多無奇，即有奇巖絕壑，又每恨水不得注」³⁸的性嗜奇險，認為處處皆有勝景，「何往而不適」的張維樞則提到：

山非必夫崇崗疊嶂之謂也，培塿亦適。水非必演洋浩漾之謂也，甃壑亦適。舟楫非必長艦巨艘之謂也，清刀亦適。矧吾家近繡川，吾舟因是吾舟，近家吾遊因是曉翠既宜，暮色更澹，寒暑都合，禽魚相親，吾寄之以委潤，泛之以四虛，和之以天籟，乘之以曼衍，吾何往而不適也。³⁹

³⁴ 明·張溥，《七錄齋別集》（台北：漢學研究中心藏日本尊經閣文庫景照本，明刊本），卷一，〈三蔡稿題詞〉，頁45。

³⁵ 明·徐階，《世經堂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出版公司，1997）集部79冊，卷三，〈遊太嶽山詩序〉，頁48a-49a。

³⁶ 明·黃仲昭，《未軒公文集》（台北：漢學研究中心藏日本內閣文庫景照本，明嘉靖三十四年刊本），卷六，〈南都壯遊詩序〉，頁23。

³⁷ 明·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卷九，〈開先寺至黃岩寺觀瀑記〉，頁25a-b。

³⁸ 明·王世懋，《王奉常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出版公司，1997）集部133冊，卷十二，〈遊九鯉湖記〉，頁12b。

³⁹ 明·張維樞，《澹然齋小草》（台北：漢學研究中心藏日本內閣文庫景照本，明萬曆四十三年序刊本），卷四，〈天遊記〉，頁24-25。

張維樞認為心靈上的寫意、閒適最為重要，出遊的場所甚至是船舶都只是配角，張氏強調心靈上取得了閒適，則無入而不自得。朱曰藩（嘉靖 23 年進士）也認為「君子之遊固自有道，正不在尋山陟嶺，必造幽峻」，⁴⁰若能適情適性，實未必要得覽絕景才能得到遊賞的樂趣。但若能登臨崇山幽壑，一覽鬼斧神工的勝景，則不但可以「供娛樂，極耳目之欲」，⁴¹更可以自高於俗士，加強己身遊歷的特殊，具有耳目之娛以外的心裡功效。只是遊歷奇險之處不只需要堅定的遊賞心念，更需要身體力行，劉侗在攀登廬山之時便曾遭遇危險，他心有餘悸的回憶說：

一洞射風，口緊腹脹，予吻袖而下，偶為苔滑，一決其袖，而氣吸不得呼，几為禁絕。老人病人，斷不可做此觀矣。⁴²

因此，老人、病人以及身體不夠強健的文士都不可前往奇險之處遊賞。朱國禎更認為除了興致之外，身體的各個部位也必須加以調養，並選擇合適的奴僕，才具備遊賞奇險之處的資格，他說：

癖耽山水，不顧功名，可謂山興；瘦骨輕軀，乘危涉險，不煩筇策，上下如飛，可謂山足；目擊清輝，便覺醉飽，飯纔一溢，飲可曠旬，可謂山腹；談說形勝，窮狀奧妙，含腴咀雋，歌詠隨之，若易牙調味，口欲流涎，可謂山舌；解意蒼頭，追隨不倦，搜奇剔隱，以報主人，可謂山樸，備此五者，而謂之山人，不亦宜乎。……人予五者無一庶幾焉，而漫曰遊山必非真實。⁴³

⁴⁰ 明·朱曰藩，《山帶閣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出版公司，1997）集部 110 冊，卷二十八，〈兩山遊錄序〉，頁 5b。

⁴¹ 明·金幼孜，《金文靖公文集》，卷八，〈巢筠別業記〉，頁 606。

⁴² 明·劉侗，〈廬山三石梁記〉，收入胡迎建編，《遊記卷》（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頁 152。

⁴³ 明·朱國禎，《湧幢小品》，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子部 1173 冊，卷十七，〈山遊〉，頁 35a-b。

也正因為奇險之處具有嘗試的難度，也提高了人們對前往遊賞者的評價，因此有更多的文人不顧危險，堅持前往，讓好奇嗜險成為明代文士遊賞中的特殊型態。

明人遊歷江湖，多寄住於寺廟之中，⁴⁴與僧家談禪論學的風氣，普遍的存在於當代文人生活中，顧起元（1565-1628）曾自言好山寺之遊：

性好山寺，每一遊歷，意輒欣然，尤於荒涼岑寂之區，倍為延佇。自謂宿世有空門緣，所交縉流頗眾。⁴⁵

湛若水（1466-1560）、霍韜（1487-1540）兩人亦曾「屏騶從，角巾野服，同跨蹇出南門外，盤桓佛寺中論學，至暮而返」，⁴⁶於遊觀寺院之際更提升心靈境界。即使是優遊寺觀，文士也多著眼於風光景致，與平民百姓往寺觀進香的功能性有所不同，姜寶（1514-1593）更對於曾經遊歷過的寺院風景作了一番品評：

自今言之，靈谷較他寺為最幽勝，其無梁殿、八功德水、琵琶街、吳道子畫壁，今存者二，及五里松徑則尤幽之幽、勝之勝也。報恩寺欵制倣大內，以塔勝；天界寺規模亦廓大，以半山亭勝；能仁稍荒毀，然亦寺之大者，以多竹勝，西天寺之幽，觀音閣之雅，靜海寺潮音閣之高聳，內一山洞亦稱奇，總不及高座寺諸剎樓閣之映帶，竹樹之交加，又以梅岡之雨花臺而增勝，是為都城外一大觀。春月遊人所湊集，近靈谷有梅花塢，近雨花臺之西有桃花塢，萬樹繽紛，花時則芳馨爛漫特甚。⁴⁷

⁴⁴ 明·顧元慶，《雲林遺事》（台中：義士出版社，1968），〈遊寓第四〉，總頁 5602。

⁴⁵ 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三，〈名僧〉，頁 85。

⁴⁶ 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卷九，〈達官騎驢〉，頁 279。

⁴⁷ 明·姜寶，《姜鳳阿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出版公司，

諸寺美景各擅勝場，或以亭勝，或以竹勝，俱為幽勝之處，既可供耳目之好，也可蕩慮滌心，遠離俗世煩憂。

二、園林臥遊

外出賞遊，對於生性好遊的文士而言，除了是前往著名景點、名山大川之外，也包含了因應花時外出賞花，暢遊園林之好，以及閱讀遊記、繪有景致的畫卷而進行的臥遊，雖然表現的形式有所差異，但其閒適好遊的心態卻是相同。

文人對於花謝花開有特殊的感知，「草色花香，遊人覺其有趣；桃開梅謝，達士悟其無常」，⁴⁸從花的凋謝中感受了世事的無情，但也因為花開的美好，和景色的明媚，則是文士寄託閒情野趣之所在，陸紹珩曾說：「雪後尋梅，霜前訪菊，雨際撫蘭，風外聽竹，固野客之閒情，實文人之深趣。」⁴⁹因為深愛花草之美，從賞花獲得閒情趣味外，更希望能夠「與梅同叟，與竹同清，與柳同眠，與桃李同笑」，當個花裡神仙。⁵⁰戴澳、夏基也是愛花之人，戴澳則因有感於西湖的花景動人，而堅持前往遊賞；⁵¹夏基則於是在二月初春之時，與朋友一同放舟於西溪，盡賞梅花盛放之美，⁵²在賞花的過程中盡得閒適真趣。朱國禎在敘述勝遊

1997) 集部 128 冊，留部稿卷五，〈金陵遊記一〉，頁 35a-b。

⁴⁸ 明·屠隆，《娑羅館清言》，收入《百部叢書集成》（台北：藝文印書館，1965）第 107 冊，卷上，頁 2b。

⁴⁹ 明·陸紹珩，《醉古堂劍掃》（台北：金楓出版社，1986），卷四，〈靈〉，頁 72。

⁵⁰ 明·陸紹珩，《醉古堂劍掃》，卷七，〈韻〉，頁 120。

⁵¹ 明·戴澳，《杜曲集》（台北：漢學研究中心藏日本尊經閣文庫景照本，明崇禎刊本），卷八，〈金華三洞記遊〉，頁 14。

⁵² 明·夏基，《隱居放言》（台北：漢學研究中心藏日本內閣文庫景照本，清康熙三十二年刊本），卷二，〈西溪尋梅記〉，頁 19。

佳境之時，除了太湖月色、錢塘潮、普陀山看海及日出等山光水色外，更歷數花木勝遊之處道：

江南花木勝遊，梅時玄墓，菊時婁江，桃華時蟠瑤，芙蓉時西湖，木時菁山葛僊井，楊梅時光福，櫻桃時北固山。而時令佳境則太湖月，錢塘潮，兩天目松石，棲賢筍洞，山茶鷹窠，普陀山看海及日出，庶幾得之。⁵³

朱氏以花木開放時期為本，介紹遊賞勝地，可以想見花木開放對山川景致的增色，姜寶（1514-1593）記雨花台的美景，也是極言其花樹繽紛之美：

竹樹之交加，又以梅岡之雨花臺而增勝，是為都城外之一大觀，春月遊人所湊集。近靈谷有梅花塢，近雨花臺之西有桃花塢，兩塢萬樹繽紛，花時則芳馨爛熳特甚，予與袁宗伯、顧司馬所嘗遊。

54

袁中道自言有山水癖，不但對於都城中的泛舟之樂多所領會，也喜歡賞花，他曾接受舉人劉百世賞荷之邀，坐小船到淨業寺看荷花，「以小舟泛湖穿花中，濃香襲人」，「月色晶明，聽童子按拍高歌，隔岸遊人亦以歌相答」，可以想見當日月色清明，荷花香氣襲人，袁氏一行人一面感受群花圍繞的詩意，一面聆聽童子按拍高歌，非常愜意。⁵⁵曹學佺（1574-1646）亦曾於春日，與范東生、黃伯傳、陳惟秦、許裕甫等友人，相約前往太湖看梅，他並翔實地記錄洞庭四周的花訊稱：

其地多產果木，為梅，為梨，為橙，為橘之屬。垂實時勝，梨花

⁵³ 明·朱國禎，《湧幢小品》，卷二十七，〈勝遊佳境〉，頁 1a。

⁵⁴ 明·姜寶，《姜鳳阿文集》，卷五，〈金陵遊記〉，頁 35。

西山，用村盛桃杏，東山盛梅與橘，開花之時，村落上下，隱見無間也。⁵⁶

曹學佺不只喜看梅花，對於洞庭四方的花訊更是瞭若指掌，可知他對於遊賞看花的熱中。滿山遍野的花開景致，充滿碩大之美，對於賞花，高濂也有其深刻的描寫：

秋時策蹇入山看花，從數里外便觸清馥。入徑，珠英瓊樹，香滿空山，快賞幽深，恍入滅金屎世界。……歸攜數枝，作齊頭伴寢，心清神逸，雖夢中之我，尚在花境。⁵⁷

這是說獨自一人入山看花，在滿山香花的陪伴下，彷彿置身仙境，即便結束賞花回到日常生活之中仍無法忘懷，可以想見賞花之趣的深刻雋永。

園林之美，在於苦心營造，讓人工園池具有自然山水的景致，而能在臥榻之間感受山水。營建私家園林的情況在明代後期相當普遍，陳繼儒（1558-1639）等人都擁有自家園林，謝肇淛也指出人工雕琢無法比擬自然形成的名山大川，但在江北無山之處，多營建園林以資臥遊：

假山之戲當在江北無山之所，裝點一二，以當臥遊。若在南方，出門皆真山真水，隨意所擇築，菟裘而老焉。或映古木，或對奇峰，或俯清流，或距磐石，主客之景皆佳，四時之賞不絕，即善繪者不能圖其一二，又何迭石累土之工所敢望乎。⁵⁸

⁵⁵ 明·袁中道，《遊居柿錄》（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卷十一，頁262。

⁵⁶ 明·曹學佺，《石倉全集》（台北：漢學研究中心藏內閣文庫景照本，明刊本），卷三，〈泛太湖遊洞庭兩山記〉，頁11。

⁵⁷ 明·高濂，《遵生八箋》，頁239。

⁵⁸ 明·謝肇淛，《五雜俎》，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謝氏雖強調南方的真山真水遠勝園林之美，然而山川之美，未必人人可以親至親見，無法遠遊之時，精雕細琢的園林美景成爲可資遊覽之處。劉鳳（1517-？）便認爲能夠興建自家園林，是因爲時值太平之世，讓人可以用心於遊觀之上：

夫園囿之勝，非熙世不能有，而遊適遣外，寄意於潤壑林阿，非曠達宏放有好之士能爾哉。…予素無累，惟託於遊。……觀之勝有宜於曠遠者，眺瞻登陟，眇望無限也。有宜於迴絕者，地勢幽偏奧如也，□如也，疏寥闕寂，若不在塵中。⁵⁹

園林之中有假山，有細流，廣植花木，雖然無法媲美真正的山林景觀，但仍擁有與閒遊相同的意境及趣味，也因此，李豫亨有「人生可不營園林，但不可無園林趣味」⁶⁰之說。金幼孜（1368-1431）亦在家中闢園築樓，盡享園居之樂：

佳時暇日，與故人賓客盤桓於斯樓之間，或雅歌投壺，或彈棋酌酒，覽雲霞於掌握，撫蒼翠於目前，沐清風而挹爽籟，送夕陽而迎素月，休於乎適於乎宜，何如其樂也。⁶¹

程文德（1497-1559）認爲「世之耽山林者忘臺觀，侈園囿者儉陂池，美不可以兼得」，⁶²但對於無以遠遊名山勝水感受自然美景者而言，在園林之中感受清風月色之好，「几席之內，靡非湖山，不雙屐而畢登，不

子部 1130 冊，卷三，頁 35a-b。

⁵⁹ 明·劉鳳，《劉子威集》，卷四十二，〈吳園記〉，頁 38a-39b。

⁶⁰ 明·李豫亨，《推篷寤語》，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出版公司，1997）子部 85 冊，卷六，〈還遊覽之真〉，頁 34a-b。

⁶¹ 明·金幼孜，《金文靖公文集》，卷八，〈巢筠別業記〉，頁 606。

⁶² 明·程文德，《程文恭公遺稿》，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出版公司，1997）集部 90 冊，卷十二，〈金陵徐氏三園記〉頁 2a。

扁舟而畢濟」，⁶³仍是不可多得的閒情逸致。不過，有些園池之美遠近馳名，遊人紛紛入園欣賞，甚至有「遍入何嘗問主人」⁶⁴的情況，讓主人原先闢園以享閒適的立意頓失。這也反映了園林景致的引人入勝，相較於自然山水亦不遑多讓。

對於好遊的文士而言，能夠如同高濂一般「到高崗，步邃谷，延留宴坐，見懸崖瀑流，古木垂蘿，闕閑岑寂，終日忘返」，⁶⁵自然是為最高的享受，觀賞美景之時，若能順勢吟詠一詩，更是寫意。⁶⁶但即便是不憚險難，立志遠遊的文士，也必須以強健的身體作為出遊的憑藉。顧起元便感嘆自己因為年紀關係，對於登高陟遠之事，已經是心有餘而力不足。⁶⁷許多文士因為年歲漸長、病痛漸增，⁶⁸消弭了許多出遊五嶽的興致，⁶⁹只能轉而效法宗少文的臥遊之舉，藉由閱讀嶽圖、海經、洞函嶠錄等古代地理圖經，及當代文人書寫的遊記，⁷⁰讓自己進行心靈上的神遊。雖是「紙上幻觀」，⁷¹卻也能夠達到遊觀的效果，也有其特殊意涵。陳繼儒便認為山遊極難，不但必須克服山路險絕等自然因素，也必須調整心情，不泥於俗務，困於老病，方得以盡得遊山之趣，他說：

⁶³ 明·朱賡，《朱文懿公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出版公司，1997）集部 149 冊，卷二，〈逍遙樓記〉，總頁 171。

⁶⁴ 明·李豫亨，《推篷寤語》，卷六，〈還遊覽之真〉，頁 34a-b。

⁶⁵ 明·高濂，《遵生八箋》，頁 351。

⁶⁶ 明·高濂，《遵生八箋》，頁 351。

⁶⁷ 明·顧起元，《懶真草堂集》，收入明人文集叢刊（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1：29，卷十九，〈遊三茅山記〉，總頁 3057-3058。

⁶⁸ 明·袁中道，〈東遊記二十四〉。

⁶⁹ 昔宗少文好遊名山，西走荆巫，南登衡岳，晚歸江陵，歎曰：「吾老矣，諸山恐難遍歷，惟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經悉圖之於室，故後以宗少文事為「臥遊」代稱，指憑藉書圖，遙想山川美景，使己身如遊其境。上述文字引自明·李濂，《嵩渚文集》，卷五十八，〈乙巳春遊稿序〉，頁 3b。

⁷⁰ 明·袁中道，《珂雪齋前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集部 181 冊，卷二十二，〈寄楊文弱〉，總頁 2312。

⁷¹ 明·載澳，《杜曲集》，卷八，〈靈巖四洞紀遊〉，頁 2。

且山遊雖難，我知之矣，……俗子命車，則風雷雨電隨其後，非素具靈根者不能遊。……非有膽智者不能遊，……非捷如猿鳥而頑如樵牧者不能遊，……非精爽壯旺而好奇者不能遊，諸遊具矣，而糾於俗務，頓於老病，左於非時，……甚矣，遊之難也。

72

山遊甚難，因此在欲遊而不得的情況下，不得不退而尋求紙上陳跡，讓自己在展覽圖集、遊記之時，彷彿置身於其間，也可稍稍寬慰不得實遊之憾，因此陳繼儒強調可資臥遊之書卷，「君子不可不有」。⁷³雖然陳繼儒、顧起元等人瞭解山遊之艱辛，認為臥遊之事有其存在價值，王世懋（1536-1588）則持相反態度，認為憑藉畫卷、遊記進行臥遊，便可得山水真趣的想法視野太小：

今夫宗少文之臥遊，天下以為美，然吾以為未數有得也，少而係情於山水，老而不能忘情焉，彼其以山水為實理，而以丹青為實寓斯其於用情也，真小矣。⁷⁴

對王氏而言，山水美景是實際存在的事物，不經由實際感受，光用丹青、遊記加以陳述，無法完全的體現出山水之美，寓情於圖像文字，以為可以代替實遊山水之趣，而天下更以為此為美事，實在是視野狹小的想法。鄧原岳（萬曆 20 年進士）遍遊名山，認為己身徜徉山水之樂，較之於臥遊之樂為高。⁷⁵姑且不論臥遊或實地遊賞何者可得遊觀真趣，從臥遊成為無法實地賞遊者的遊觀方式，可以想見文士對於山水之好的執

⁷² 明·陳繼儒，《晚香堂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集部 66 冊，卷三，〈臥遊清福編序〉，頁 11a-b。

⁷³ 明·陳繼儒，《晚香堂集》，卷三，〈臥遊清福編序〉，頁 10b-11a。

⁷⁴ 明·王世懋，《王奉常集》，卷十三，〈鶴螟堂記〉，頁 13a。

⁷⁵ 明·鄧原岳，《西樓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出版公司，1997）集部 174 冊，卷十八，〈與林熙工〉，頁 25a。

著，即便無法真正用耳目感受實景的美好，也希望能夠用想像的方式遊歷其中，在當時遊觀風氣風行之下，文人無論能遊、不能遊都大談能夠感知山水之美的心態，相當值得注意。

第二節 庶民攬勝

江南地區由於具有經濟繁榮、人文昌盛及交通便利等得天獨厚的優越條件，自古便有「吳人好遊」之說。而明代中葉以後，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生活富庶安定，社會風氣更是多奢少儉，更加競節好遊，除了冬季因氣候因素不適合出遊外，其餘三季都是出遊的好時節，即便是風雨之日，也無減遊興。⁷⁶一般民眾或選擇春暖花開、氣候適中的時節，或配合歲時節令，呼朋引伴，齊往郊外踏青。由於民間節日的慶典活動聚集了大量的人潮，廟會也隨之出現。廟會除了具有百貨並陳，各色人物匯集，買賣興旺的商業功能外，更具有演劇、賞花燈龍燈等休閒娛樂的功能，參與廟會因此成為當時平民攬勝中相當普及的活動。更有因宗教因素，組成「香社」的群眾組織，前往武當、普陀等地祭祀燒香的情況，隨著進香隊伍進行長距離的旅行，在達成宗教想望之餘，更飽覽了異地風光。遊觀形式的豐富多元，旅遊風氣的普及大眾，使明代中後期的庶民休閒生活顯得多采多姿。而以往生活空間多只限於閨閣的婦女，也在這樣的遊觀風氣之中獲得稍許的開放，積極的參與攬勝活動，展現出明代的特殊風貌。本節即以呈現平民攬勝活動為主，兼及婦女走出閨閣，從事遊賞活動的情況，以求較為全面的勾勒明代遊觀文化的全貌。

⁷⁶ 《嘉靖吳邑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出版公司，1995）史部 181 冊，卷一，〈歲時〉，頁 15a-b；明·姚旅，《露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出版公司，1997）子部 111 冊，卷八，〈風篇上〉，頁 26a；《萬曆長洲縣志》收入《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北京：中國書店，1992）第 11 冊，卷一，〈風俗〉，頁 6b。

一、歲時

中國自古以來便有野遊的傳統，每當春秋社日，農民為祈禱或慶賀好收成，時常舉行各種慶典活動，通過醮會的形式，聚集多人，歌唱舞蹈，甚而抬閣走會，分享豐收的喜悅。⁷⁷到了明代，庶民出遊的情況不再只侷限在春秋社日，元宵、清明、端午、中秋等節日除了原先所具有的節令功能外，元夕張燈、清明掃墓踏青、端午競渡、中秋賞月更成為絕佳的遊觀活動，男女爭相出遊，好不熱鬧。

正月十五是為上元節，是夜時俗多設筵席宴賞親友，並燃燈以為慶祝，張燈結綵五日，到處火樹輝煌。上元日除家戶設燈外，在神祠會館等處，更是華燈萬盞，有「燈宴」之名。士女多以看燈為名紛入城市，往來遊觀於茶壚酒肆之間，到了半夜三更才散去。⁷⁸當時杭州因出產多種燈具，並因為地理關係而匯聚了來自大江南北的特殊商品，再加上杭人喜歡建構巨大、繪有彩繪圖案的燈架，各色燈具加上精美燈架，吸引了大批的人潮，使得上元節當天的杭州顯得特別熱鬧，張瀚以為這種士庶競相參與的情況是杭地的特色。⁷⁹實際上元夕賞燈各地表現雖有小差異，⁸⁰但士女趁燈節遊賞的心態則是相同，賞燈人潮洶湧的景象在張岱

⁷⁷ 陳寶良，《明代的社與會》（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頁458。

⁷⁸ 清·顧祿，《清嘉錄》（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卷一，〈燈節〉，頁16b-17a。

⁷⁹ 張瀚提到元宵賞燈之民俗，最盛于杭，「以皮絹紗紙之燈，皆產於此。而南北貴重如閩中珠燈、白下角燈、滇南絲料燈，皆萃焉。民間跨街構木為坊，飾以彩繪。至暮，燈火相望，金鼓相聞，一時男女塞途，競相追逐。他省所無」，見明·張瀚，《松窗夢語》，卷七，頁126。

⁸⁰ 如蘇州府「通衢下設華燈」「行遊五日而罷」，《正德姑蘇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0），第12冊，卷十三，〈風俗〉，頁897-898；松江府「通衢作燈市，遊人往來達曙」，《正德松江府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出版公司，1995），史部181冊，卷四，〈風俗〉，頁3a；湖

的筆下有生動的描述，可以想見當時的熱鬧情景：

自城隍廟門至蓬萊岡上下，亦無不燈者。……好事者賣酒，緣山席地坐，山無不燈，燈無不席，席無不人，人無不歌唱鼓吹。男女看燈者，一入廟門，頭不得顧，踵不得旋，只可隨勢，潮上潮下，不知去落何所，有聽之而已。⁸¹

清明節則是家家插柳於門戶之上，並設奠宴享祖先，而後準備時食及酒餚，拜掃先墓，以示慎終追遠之意。由於時值暮春，氣候和煦宜人，正是踏青出遊的良辰佳時，民眾多「借祭墓為踏青遊戲之具」，而為祭拜準備的酒肴則為「謔浪酩酊之資」，正可作為遊賞時的吃食，⁸²因此在掃墓之後，民眾大多把握機會沿途遊觀，「下午必就路之所近，遊庵堂、寺院及士大夫花園」，祖先墓塚附近的寺院尼庵及士大夫花園都成為賞遊之所。⁸³方志作者也注意到此一情況，提到清明日民眾踏青惠山等地，處處都是遊人大盛的景象，可以發現除了掃墓之外，其實外出遊賞才是重要的目的，也因此各地掃墓之日遊觀民眾大增的情況著實常見。⁸⁴遊人或於山家野店，享受美食，肆意遨遊，或乘坐畫舫於湖川之上笙歌，直至日暮，樂而忘返。⁸⁵

州府「競賞上元橋上」《同治湖州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卷二十九，〈風俗〉，頁14b；新昌縣「男女出遊賞」，《萬曆新昌縣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第七冊，卷四，〈風俗·歲時〉，頁4b。

⁸¹ 明·張岱，《陶庵夢憶》，卷八，〈龍山放燈〉，頁215。

⁸² 明·謝肇淛，《五雜俎》，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子部1130冊，卷二，頁9b。

⁸³ 明·張岱，《陶庵夢憶》，卷一，〈越俗掃墓〉，頁24。

⁸⁴ 清·黃印，《錫金識小錄》（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卷一，〈備參上·風俗〉，頁22b。

⁸⁵ 田汝成便提到時人藉清明拜墓出遊的情致：「是日，傾城上塚，南北兩山之間，車馬闐集，而酒尊食壘，山家村店，享餽遨遊，或張幕藉草，並舫隨波，日暮忘返」，見明·田汝成，《西湖游覽志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卷二十，〈熙朝

五月五日為午節，民間多以製作粽子、遍插蒲艾、飲雄黃酒、戴香囊慶祝。而端午競渡，特別為士女所喜好，在午節當天前往觀賞，是一年中的大事。競渡開始具備遊賞活動的性質，不再只是單純的慶典活動，例如袁袞（1502-1547）在池陽觀龍舟競渡，便注意到當地士女齊聚江畔觀賞競渡，「幹多方舟幕布，布席羅酒漿釘箸，笑謹如狂」，除了布置舒適座位方便觀賞外，更張羅酒食茶餚，讓自己及朋友能在觀賞競渡時享用。⁸⁶一邊欣賞龍舟兩兩相競的景象，一邊飲酒作樂，呈現熱鬧愉悅的景象。

八月十五中秋，民間取月餅團圓之意，相互餽贈，多設賞月之宴，登樓臺待月，以「玩月為樂」。⁸⁷田汝成載「是夕，人家有賞月之燕，或攜榼湖船，沿遊徹曉。蘇堤之上，聯袂踏歌，無異白日」，⁸⁸可以想像中秋之夜，杭人出遊西湖賞芙蓉，沿著湖畔飽覽沿途風景，在蘇堤之上，歌聲嬉笑聲不斷，與白天西湖熱鬧的景象無異。吳人則是傾城前往虎丘遊賞，張岱便提到他印象中的虎丘中秋夜「土著流寓、士夫眷屬、女樂聲伎、曲中名妓戲婆、民間少婦好女、崽子變童，及游冶惡少、清客幫閒、僉僮走空之輩，無不鱗集」，⁸⁹笙歌徹夜，熱鬧異常。遊人集於西湖、虎丘等勝地，或走或坐以待月出，除賞月外，也遊賞了勝地風光。

八月十八日，俗稱「潮生日」或「潮頭生日」⁹⁰，士女多往乍浦看

樂事》，頁 291。

⁸⁶ 明·袁袞，《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出版公司，1997）集部 86 冊，卷 15，〈池陽觀龍舟記〉，頁 23a-b。

⁸⁷ 《萬曆杭州府志》，收入《明代方志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5），卷十九，〈風俗〉，頁 19a。

⁸⁸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二十，〈熙朝樂事〉，頁 293。

⁸⁹ 明·張岱，《陶庵夢憶》，卷五，〈虎丘中秋夜〉，頁 152。

⁹⁰ 《乾隆上海縣志》，收入《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北京：中國書店，1992）第 1 冊，卷一〈風俗〉，頁 3a。

潮，較平時高出一、二尺的大潮著實壯觀。除了觀看漲潮景況外，遊人更多藉看潮為名，搭乘舟船，載著酒餚、鼓樂，隨著水流四處遊覽，賞景飲酒，好不逍遙。⁹¹在方志中亦有「遊觀亦此日最盛」⁹²的記載，更因為人潮洶湧，婦女髮上簪釵多遭擠落，在遊人經過的路途上，屢屢可以撿拾到婦女遺落的簪釵等飾品，⁹³除了可見當日遊觀盛況外，更可發現婦女出外賞景的熱絡。

聚集大批人潮的地方，往往商販輻輳，因應人潮而出現的燈市、划龍船市等，也提供士庶百姓絕佳的賞遊去處，例如為了正月十五的上元節，從臘八之後到立春之前，吳地的吳趨坊、申衙里、阜橋中市一帶，都有大批貨郎在燈市中出售各色花燈，精奇百出。⁹⁴十五當天，除了張燈結彩表示慶祝外，更有依照時間差異的慶祝活動，如白日遊觀的「看彩」，以及在夜晚擊鑼敲鼓的「鬧元宵」，前往燈市閒逛遊賞最是風行，明季著名小說《金瓶梅》中也對於當時熱鬧的燈市有所記載：

吳月娘……潘金蓮……俱搭扶定樓窗，觀看那燈市中，人煙湊集，十分熱鬧。當街搭數十座燈架，四下圍列諸門買賣，玩燈男女，花紅柳綠，車馬轟雷。⁹⁵

燈市中人潮聚集，看燈男女遊逛於燈市中，欣賞各色燈彩，好不愜意。此外還有端午節的龍船競渡，顧祿提到明代蘇州觀賞競渡人潮洶湧、喧

⁹¹ 《嘉靖太倉州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0）第20冊，卷二，〈風俗〉，頁5a。

⁹² 《萬曆杭州府志》，卷十九，〈風俗〉，頁19a。

⁹³ 「八月十八日，俗稱潮生日，士女多往乍浦看潮，自青龍觀至天妃宮，尋鈿拾翠，往往有之」，見《乾隆平湖縣志》，收入《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北京：中國書店，1992）第16冊，卷四〈風俗·歲時〉，頁2b-3a。

⁹⁴ 清·顧祿，《清嘉錄》，卷一，〈燈市〉，頁13a。

⁹⁵ 明·笑笑生，《金瓶梅》（台北：聯經出版社，1991），第十五回〈佳人笑賞玩燈樓 狎客幫嫖麗春院〉，頁138。

嘩熱鬧的景象說：

山塘七里，幾無駐足之地，河中畫楫，櫛比如魚鱗亦無行舟之路。
歡呼笑語之聲，遐邇震動。⁹⁶

人潮聚集的結果，也吸引商賈經營買賣，當地民眾看準了此一商機，在五月初便開始持續十天的「划龍船市」，⁹⁷提供觀賞競渡民眾所需物品，這種因歲時節令而形成的市集，一如尋常市集，除了茶蔬菜肉等生活必需品外、「彩妝傀儡，蓮船、戰馬，錫笙、鼗鼓，瑣碎戲具」⁹⁸等童玩及裝飾品也都是燈市中常見的商品，各地珍玩、生活用品莫不齊備，民眾遠遊其中，或購買物品，或逛街娛樂，確是相當熱鬧。

二、燒香

明人王穉登（1535-1612）在《吳社編》中評論吳地風俗「淫靡，喜訛尙怪，輕人道而重鬼神，捨醫藥而崇巫覡」⁹⁹；正德《松江府志》則在敘述當地民風時，有「信鬼好祀，至今爲然」¹⁰⁰的說法；萬曆《杭州府志》亦言「杭俗崇尙釋老，由來已久」¹⁰¹；《湖州府志》則自言「湖俗信鬼好淫祀」¹⁰²，從這些記載中可知明代江南地區民眾對於鬼神仙佛的崇敬。雖然明太祖嚴宮闈之禁，在祖訓內明載寺觀燒香降香禳告之禁

⁹⁶ 清·顧祿，《清嘉錄》，卷五，〈划龍船〉，頁 6b。

⁹⁷ 清·顧祿，《清嘉錄》，卷五，〈划龍船〉，頁 6b。

⁹⁸ 明·田汝成，《西湖游覽志餘》，卷二十，〈熙朝樂事〉，頁 291。

⁹⁹ 明·王穉登，《吳社編》，收入《百部圖書集成》（台北：藝文印書館，1965）第 116 冊，頁 1a。

¹⁰⁰ 《正德松江府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出版公司，1997）史部 181 冊，卷四，〈風俗〉，頁 13a。

¹⁰¹ 《萬曆杭州府志》，卷十九，〈風俗〉，頁 20b。

¹⁰² 《同治湖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卷二十九，〈風俗〉，頁 4a。

令，並有違者處死的嚴厲懲處，¹⁰³民眾雖明知禁令，卻仍甘冒不韙，除了在歲時節令之時進行相應的慶祝活動外，在神祇的誕生日，或特定的節日中，也會前往廟宇朝貢奉拜，祈求平安圓滿。¹⁰⁴然而，就如同諺語所說「天下名山僧占多」，許多寺廟往往座落於山林之中，前往燒香禮佛，除了滿足心靈上的虔敬外，更可賞遊廟宇及附近區域的風光，身心同時獲得休憩，對於當時的庶民百姓而言，是相當重要的日常遊觀機會。

無論是全國奉祀的神祇，或是只在江南地區的神祇，每遇其生辰誕日，民眾往往謁廟燒香，表達崇敬之意，在明代方志中屢屢可見其盛況之描寫。正月十三，相傳為驅蝗之神劉猛將軍¹⁰⁵生辰，官府致祭，由於相傳「神能驅蝗，天旱禱雨輒應，為福畎畝」，故鄉人奉祀相當虔敬，前後數日，各鄉村民除備妥牲禮獻祭外，更抬像遊街，男女老少裝扮成隸卒，沿途鳴金擊鼓，以為慶祝¹⁰⁶。

二月十九日為觀音大士誕辰，上天竺建觀音會，庵院皆設齋念佛，城中士女則於當天前往佛殿燒香。¹⁰⁷此日盛況，以杭州上天竺為東南之最，此地聚集了當地民眾以及來自各地的香客，因為前往普陀的海路中斷，大量的香客就近於上天竺焚香祝禱。當天男女宿山¹⁰⁸者大量聚集的

¹⁰³ 明·余繼登，《典故紀聞》（北京：中華書局，1981）卷十四，頁244。

¹⁰⁴ 《乾隆安吉州志》，收入《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北京：中國書店，1992）第16冊，卷七〈風俗〉，頁21a。

¹⁰⁵ 在江南地域社會的傳說故事中，驅蝗之神劉猛將軍相傳是南宋末年的抗金名將劉銳、劉錡或劉宰。到了雍正年間納入祀典後，劉猛將軍的身份出現了全國性的版本，成為元末指揮有功，殉節而死的劉承忠。關於劉猛將軍的身份及納入祀典的過程，可以參見蔣竹山，〈從打擊異端到塑造正統：清代國家與江南祠神信仰〉，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頁124-131。

¹⁰⁶ 清·顧祿，《清嘉錄》，卷一，〈祭猛將〉，頁11b。

¹⁰⁷ 明·田汝成，《西湖游覽志餘》，卷二十，〈熙朝樂事〉，頁290。

¹⁰⁸ 所謂「宿山」是指帝誕之日，男婦先後入廟燒香，是夜即於廟內外席地而坐，守至天明。

結果，殿內外甚至無可立足之處。¹⁰⁹民眾到了寺廟，「或施佛前長明燈油，以保安康，或供長旛，云求子得子。」¹¹⁰而三月三日，民間傳為北極佑聖真君¹¹¹生辰，當天民家多在家以鮮花水酒祭拜，寺觀為恭祝真君生辰，也多建醮祭祀，¹¹²場面十分盛大，也吸引了許多的民眾前往燒香。當天進香者駢集，使用的交通工具甚至是「筍輿踵接，畫舫尾銜」¹¹³，可以推知當日之盛況。至於三月二十八日，相傳為東嶽齊天聖帝¹¹⁴生辰，供奉聖帝的寺觀，在吳地以江灣鎮代表，在杭則以在吳山上者為盛。當天士女前往寺觀答賽捻香，人數之眾，所乘舟船、轎子甚至充塞必經

¹⁰⁹ 明·張岱，《西湖夢尋》（台北：金楓出版公司，1987），卷二，〈上天竺〉，頁 83。

¹¹⁰ 清·顧祿，《清嘉錄》，卷二，〈觀音生日〉，頁 4b。

¹¹¹ 北極佑聖真君又稱玄武、真武帝君、盪魔天尊。道教尊奉為執掌北方天界的重要天神。在《元始天尊說北方真武妙經》提到真武真君本為淨樂國天子，長而勇猛，願除天下妖魔，後得真人傳授無極上道，入太和山修道而得願滿，玉帝敕鎮北方，統攝真武之位，並將太和山改為武當山。宋朝天禧年間（1017-1021）詔封真武靈應真君，元大德七年（1301）加封元聖仁威玄天上帝，成為北方最高神。明太祖平定天下後，建廟於南京崇祀。靖難之後，明成祖以為神顯相相助，加封為北極鎮天真武玄天上帝，並於武當山大建宮觀廟堂以祀之。由於皇帝的提倡，真武信仰在明代達於鼎盛，宮廷與民間普遍建立真武廟。而真武神像旁的龜蛇或金童玉女據說是替真武記錄三界中的功過善惡。誕日為農曆三月三日。關於北極佑聖真君信仰的傳播及奉祀情況可以參照《明史》，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史部第 55 冊，卷五十，頁 671-673；以及中國道教協會辭典編輯委員會，《中國道教大辭典》（台中：東久，1996），「北極佑聖真君」及「真武大帝」部分。

¹¹² 明·田汝成，《西湖游覽志餘》，卷二十，〈熙朝樂事〉，頁 290。

¹¹³ 《古今圖書集成》（台北：文星出版社，1964），〈職方典·蘇州府部〉，115 冊，頁 26。

¹¹⁴ 東嶽齊天聖帝為道教神名，道經稱其為執掌人間賞罰、生死大事的泰山之神。傳泰山神名為圓常龍，常服青袍、帶碧冠、馭青龍、統百神，主治死生與人世貴賤，為冥府眾鬼之主帥。東漢明帝封其為泰山元帥，武則天封為天齊君，唐玄宗封為天齊王，宋真宗加號天齊仁聖帝，元世祖封為東嶽天齊大生仁聖皇帝，清朝時封為天齊仁聖大帝。道教和民間習稱東嶽大帝，常於夏曆三月二十八日東嶽聖誕舉行祭祀。詳細情況可見中國道教協會辭典編輯委員會，《中國道教大辭典》，「東嶽大帝」條，頁 662。另可參見巫仁恕〈明清江南東嶽神信仰與城市民變〉「中國的城市生活：十四至二十世紀國際研討會研討會」會議論文（南投：暨南國際大學，2001.12）中對於東嶽神信仰的流變及信仰與民變關連的分析。

道路，必須耗費相當時間才能進入寺觀燒香。¹¹⁵善男信女到了寺觀之中，奠獻花果、誦經上壽，部分民眾在身上裝著枷鎖，伏跪於神前，請求神祇為之消災解厄，廟宇之中整天都是鐘鼓法音繚繞，非常熱鬧。¹¹⁶

而土地神除誕日祭祀外，每月初二、十六之時亦需加以祭拜，特別是從事商賈之人，以祭拜土地祈求買賣順利。城隍神亦同，在誕日，每月初一、十五，春秋仲月及每年三次祭癘¹¹⁷之時都必須致祭，更由於各地所供奉的城隍身份有所不同，江南地區方志中關於城隍祭典、時間之記載亦多有差異，不過由於城隍信仰在明代極為興盛，城隍神賽會及祀典都有大批善男信女參與，香花儀從之盛，絡繹於途，場面十分盛大，賽會沿途都呈現出游人雜沓的情況。而在三元日的三官誕辰¹¹⁸、五月十三日的重關聖誕辰¹¹⁹、七月三十日的地藏生日等的神祇誕日，亦是一片舉國若狂的景致，士女進香者甚眾。

除了江南地區的寺觀外，各地相傳靈驗的廟宇也往往成為民眾謁廟燒香的重鎮，即使是有一海之隔的普陀山，民眾前往進香的決心也絲

¹¹⁵ 《古今圖書集成》中記載此日盛況：「三月二十八日俗傳為東嶽天齊聖帝生辰，其行宮在江灣鎮者最盛，清明前後十餘日，士女拈香，闡塞塘路，樓船野舫，充滿溪河」，見《古今圖書集成》第676卷，〈職方典·蘇州府部〉，115冊，頁26。

¹¹⁶ 明·田汝成，《西湖游覽志餘》，卷二十，〈熙朝樂事〉，頁291。

¹¹⁷ 此三次祭癘時間是指每年清明、七月十五、十月朔日。在城隍主祭厲壇之後，會進行出巡活動，俗稱為三巡會，是城隍祭典中相當重要的儀式活動。

¹¹⁸ 三官指上元一品天官賜福大帝、中元二品地官赦罪大帝，下元三品水官解厄大帝。祭祀情況及神話傳說可以參見中國道教協會辭典編輯委員會，《中國道教大辭典》，「三官大帝」條，頁103。

¹¹⁹ 即關聖帝君，又名蕩魔真君、伏魔大帝等。是道教祀奉的重要護法天神，民間信仰極為普遍，關帝廟遍佈全國鄉鎮各地。關帝信仰來自三國武將關羽的形象，經過三國演義的渲染幾乎家喻戶曉，成為集忠、孝、節、義於一身的典型代表。明清之際列入國家祀典，加以祭祀。關聖帝君既是武神又是財神，具司命錄、佑科舉、治病除災等能力。在台灣又稱伽藍爺、恩主公。誕辰為農曆五月十二日。歷代的封贈可以參見中國道教協會辭典編輯委員會，《中國道教大辭典》，「關聖帝君」條，頁1397

毫不減，明人王士性《廣志繹》載：

補（普）陀大士道場亦防汛之地，在海岸孤絕，與侯濤山隔，旦晚二潮。近日香火頓興，飛樓傑閣，巖然聖地。春時進香人以百萬計，捨貲如山，一步一拜，即婦女亦多渡海而往者。¹²⁰

進香人數以萬計，可以想見其盛況。而遠在均州（今湖北省）的太和山（武當山），也因為受到官方策封，香火極為鼎盛，前往燒香者更是「萬方士女駢闐幅湊，不減泰山」。¹²¹蘇州府更有專為前往太和山進香所組成船隊，每年一次，陣容非常浩大。王永積（1600-1660）在《錫山景物略》一書中便提到了蘇州民眾組成船隊前往太和山進香，船艦齊聚於無錫北塘的盛況：

香燈，他邑未有也。歲二月，無定日；巨艦百十艘，無定數。乃□人之之武當山，進香者，蠲吉啟行，至北塘，謂之齊幫，畢集焉。其來以鳴鑼為號，自南而東而北，聲振林木，邑人士及大家宅春，聞聲遂空國出。其燈貫索於高樞之首，各紮燈架，或四方、或八角，空其中而懸於旁，燈燈相續，連屬而下，如貫豬、如星橋。其燈數以人數為準，每進香一人，人懸一燈，每舟若干人，則懸若干燈。燈先入水，燈燈倒映，每舟懸若干燈，每舟底即映若干燈。懸燈後花炮四發，煙花入水，亦倒映，枝枝朵朵，上下一色，於是香船百計，看燈之船千計，香燈懸於檣頂，看香燈船之燈懸於船窗，香燈純用紙燈，看香燈船之燈間以、紗燈、珠燈、水晶羊角燈。香船純鑼聲，或木魚聲，看香燈隻船佐以歌聲、笑語聲，蕭鼓殼吹，彈絲竹殼，人煙如沸，水面通紅，至宵分始散。通毘陵無北塘，大水舟不復聚，燈不再懸矣，香燈，他邑未有也，

¹²⁰ 明·王士性，《廣志繹》（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72。

¹²¹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四，頁10b。

自楚中多事，殺影寂然。¹²²

由於船程遙遠，因此進香客所搭乘的船隻都是能在江湖中行駛的「巨艦」，每次進香的船數不定，都在百艘之譜。開航的時間大約都在二月，日期並不固定，由於蘇州府下有一州七縣，遠近不一，因此選定了無錫縣北門外，地點適中的北塘做為船隻的集合及出發的地點。每年到了二月的約定之日，各路進香船沿運河進入無錫，一路以敲鑼為信號。到達北塘停泊船隻後，便會立起燈架懸掛燈具，每一個香客懸掛一盞燈，連綿成串，遠望看似串串珍珠，相當美麗。明代無錫城內水道縱橫，臨河人家大多備有船隻，聽見進香船的鑼聲，民眾便傾城而出，駕船前往北塘欣賞香燈，觀燈船的數量甚至有千艘之譜，觀燈船也懸掛各色花燈，河上一片燈海，非常熱鬧，往往直到深夜人潮才逐漸散去。這樣的香燈集會相當特別，熱鬧歡樂的景象也讓王永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無錫人孫繼皋（1550-1610）也有一首名為〈泛蓮蓉湖，看香船燈與塔燈相望，因賦〉的七言律詩，描述他泛舟蓮蓉湖觀賞香燈奇景的實地見聞：

朝玄朝侶集艤艫，燈火春明亂水蓉。寶蠟薰天香裊裊，星橋連岸影重重。遙光閃塔欺靈鷲，沸焰波影駭燭龍。鉦鼓雷鳴人吁鬥，大江西望是蓼峰。¹²³

前往他地進香，必須歷經長途的跋涉，對於必須傾半生積蓄方可成行的庶民來說，朝山進香是一趟極為長程的旅行，路途生疏、語言隔閡、水土不服、關卡勒索與盜匪環伺都是必須克服的困難，但信仰的虔誠卻讓許多香客奮不顧身。進香除了完成心靈的想望外，沿途的風光景致與家

¹²² 明·王永積，《錫山景物略》，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出版公司，1995）史部 234 冊，卷四，〈北塘香燈〉，頁 33a-b。北塘香燈一事另見於清·黃印，《錫金識小錄》，卷一，〈備參上·風俗〉，頁 22a。

¹²³ 明·孫繼皋，《宗伯集》，收入《四庫全書珍本》（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3）第 4 集，別集 5，卷十，〈泛蓮蓉湖，看香船燈與塔燈相望，因賦〉，頁 33a-b。

鄉大不相同，更提供了遊覽他地風光的絕佳機會，也可視為是以朝山進香為形式的遊觀活動。¹²⁴

入寺廟燒香禮拜者，不只限於男性，當時婦女入寺廟燒香者亦眾，也因此嘉靖五年（1527）頒佈了「如有婦女出遊寺觀者，一面將婦女拏送官司，並拘夫男問罪，仍枷號一個月發落，僧道還俗」¹²⁵的禁令，萬曆年間也有大臣奏請禁止婦女進入寺觀，¹²⁶正是因為當時社會上婦女燒香情況的普遍，以致引起當權者的注意而頒佈禁令。由於相傳婦女在元宵之時，若能踏月街頭，走歷三橋，可免百病，因此當天婦女競相出遊，相當熱鬧。在八月時蘇州婦女更有「走月亮」之俗，當日婦女盛妝出遊，或至尼菴禮佛，直到雞鳴之時仍不願散去。¹²⁷婦女除了因謁廟習俗而出遊寺觀外，更有為求子而前往燒香者，部分寺觀即因而香火駢集，如杭州的法相寺便因為傳說婦女至該寺謁廟，在觸摸神像後可生男孩，以致婦女求子者紛集於該寺，眾人「爭摩（神像）頂腹」，以致神像腹部「光可鑑人」，謁廟婦人之多可以想見。

江南地區民眾本著對鬼神的敬畏，祭祀活動漸趨繁複奢華，加上商業活動的發達，明代中後期集民間信仰、商品交流、民間藝能表演於一身的廟會普遍出現，嘉靖《廣平縣志》中有這樣的記載：

廟之會，國初未有，自正德之初有此俗。先期貨物果集，酒肆羅列，男女入廟燒香，以求福利。¹²⁸

¹²⁴ 關於武當山的興盛及蘇州府進香船隊的詳細情況，可以參看顧文璧，〈明代武當山的興盛和蘇州人的大規模武當進香旅行〉，《江漢考古》1989年第1期，頁71-75。

¹²⁵ 黃彰健，《明代律例彙編》（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9），卷25，刑律八，犯姦，頁943-944。

¹²⁶ 《明神宗實錄》（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4），卷390，頁15a。

¹²⁷ 清·顧祿，《清嘉錄》，卷八，〈走月亮〉，頁2b。

¹²⁸ 明·陳棊纂，《嘉靖廣平府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第2冊，卷十六，〈風俗〉。

明代以降的廟會節慶有種類多樣化、舉行時間更爲頻繁、空間分佈更爲普遍的趨向，¹²⁹活動內容也相當豐富，在祭神活動的基礎上，發展出許多娛神亦娛人的慶祝活動。廟會期間，民眾除了競相前往進香外，在祭祀上更是煞費苦心，廟內的祭品、供品及燈彩、珍玩俱爲民間藝能的大匯集。如浙江遂昌的城隍廟會即以懸掛千盞用玻璃、紅紗、珠玉、絹綢製成的花燈爲其特色，耗費民間藝人數月之功製成，琳瑯滿目，美不勝收。¹³⁰而邑縣城隍廟多於儀門上建樓台，以供演劇酬神之用。¹³¹廟會的組織者多半會邀請戲班前來演戲，但有些以營利爲目的的民間戲班也會不請自來，戲臺上的戲劇表演十分豐富，演劇提供民眾視覺上的享受，具有紓解身心的作用。萬曆二年（1592）抄定的《迎神賽社禮節傳簿四十曲宮調》，門類有大曲、隊戲、院本、雜劇等多種，可以想見當時廟會進行時歌舞演劇規模之盛大及題材之豐富。¹³²

此外，許多廟會慶典以巡遊作爲活動的重要部分，如湖州府下的安吉州，五月十五日爲該州州城隍誕辰，每年進行長達三天的壽辰慶典，巡遊爲其中的重頭戲，由民眾各扮冥司官鬼，巡遊於城市各處，沿途吸引了眾多民眾觀賞。¹³³在江南，這樣的巡遊之風更盛，龔煒描繪吳地賽會奇觀，曾指出：

吳俗信巫祝，崇鬼神。每當報賽之期，必極巡遊之盛：整齊執事，對對成行，裝束官弁，翩翩連騎。金鼓管絃之迭奏，響遏行雲；

¹²⁹ 關於明末清初江南地區廟會活動的盛行情況，可以參見巫仁恕，〈節慶、信仰與抗爭—明清城隍信仰與城市群眾的集體抗議行為〉，《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4期（2000.6），頁153-157。

¹³⁰ 鄭土有、王森森，《中國城隍信仰》（上海：上海三聯書局，1994），頁206。

¹³¹ 明·葉夢珠，《閩世編》，卷三，〈建設〉，頁66。

¹³² 趙世瑜，〈明清時期江南廟會與華北廟會的幾點比較〉，《史學集刊》1995年第1期，頁43。

¹³³ 《乾隆安吉州志》，卷七〈風俗〉，頁16b。

旌旂幢蓋之飛揚，輝生皎日。執戈揚盾，還存大難之風；走狗臂鷹，或寓田獵之意。集金珠以飾閣，結綺綵而為亭。執香者拜稽於途，帶扭者匍匐於道。雖或因俗而各異，莫不窮侈而極觀。……致一國之若狂。¹³⁴

巡遊的隊伍，管弦迭奏，旌旂飛揚，更有「破皮肉，掛香爐於臂者」、「圍枷鎖，伏罪綁縛，如就刑者」，皆隨著神輿遍歷城市，¹³⁵沿途民眾或執香祭拜，或戴刑具匍匐於途，祈求藉由巡遊的儀式獲得赦免罪惡，人數之眾，山塘至虎丘甚至沒有一寸空隙，而婦女更有租屋觀賞的情況，¹³⁶一如龔煒所言，呈現「一國若狂」的景象。在巡遊的過程中，民眾或直接參與巡遊、扮裝，或以旁觀者的角色在旁執香、圍觀，迥異於平時的角色，走出戶外，在充滿遊戲氣息的巡遊活動中獲得心靈及行為上的解放。

而貿遷有無的「廟市」更是廟會活動的重要部分。廟市的成形根基於兩大因素，一是鼎盛的信仰所帶來的大批信眾，另一則是蓬勃進行的商品交易活動。明代中後期，社會經濟力量的發展，人們的消費能力逐漸提高，加以民間信仰所積聚的大批信眾，伴隨著每年的神祇誕辰、祭厲之日或其他特定日期，以各神祇為名的大型廟市於焉形成，參與廟市者，除了貿遷有無的商人、祭祀謁廟的信眾外，更有為數眾多的庶民、「行丐」、「募僧」及官府人員，或為祭祀朝拜，或為購買物品，或為逛街娛樂而來，買賣的物品更是各式各樣，應有盡有。

一般以當地人為主的廟市規模已是相當盛大，各色貨品紛陳，西湖的昭慶寺因為位於普陀及天竺的進香路線上，因此進香客多湊集於昭

¹³⁴ 清·龔煒，《巢林筆談》（北京：中華書局，1981），卷二，〈賽會奇觀〉，頁34。

¹³⁵ 《乾隆安吉州志》，卷七〈風俗〉，頁16a-b。

¹³⁶ 明·徐樹丕，《識小錄》，收入《筆記小說大觀》40編第3冊（台北：新興書局，

慶寺，昭慶寺兩廊無日不市，往來香客眾多，市集往往持續四個月之久，其壯觀更是「大江以東，斷無二地」。¹³⁷市集之日，人潮洶湧，劉侗觀察北京城隍廟市「行而觀者六，貿遷者三，謁廟者一。」¹³⁸廟市一方面因謁廟者眾而成形，一方面則更吸引了許多單純遊賞的民眾，增添了寺觀的遊賞功能，前往寺觀不只可以獲得心靈的平靜，更可遊逛市集，因而成爲民眾空閒時的絕佳去處。

三、郊遊踏青

吳俗好遊，自古即然，在《古今圖書集成》中，有這樣一段關於吳地好遊之風的記載：

吳人好遊，以有遊地、有遊具、有遊友也。遊地則山水園庭，多於他郡；遊具則名酒嘉餚，畫船蕭鼓，咄嗟而辦；遊友，所謂清客也，工為聲伎，富室朱門，相引而入。花辰月夕，競為勝會，聽者為之移情。¹³⁹

在遊地、遊具、遊友兼具的吳地，遊觀是普遍的風氣，春天風景明媚，百花齊放，正是遊觀的絕佳時期，無論士庶、貧富，喜歡初春之時到西山踏青，盛夏則到東蕩觀荷消暑，¹⁴⁰外出享受江南地區的好山好水、風景名勝，或遊覽富家大戶精雕細琢的山水庭園。雖非人人都可能夠「畫

1985)，卷四，〈吳中巫風〉，頁 566。

¹³⁷ 明·張岱，《陶庵夢憶》，卷七，〈西湖香市〉，頁 189。

¹³⁸ 明·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卷四，〈城隍廟市〉，頁 245。

¹³⁹ 《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蘇州府部〉，頁 25a-b。

¹⁴⁰ 《萬曆長州縣志》，收入《稀見中國地方誌彙刊》（北京：中國書店，1992）第 11 冊，卷一，〈風俗〉，頁 6b。

船遊泛，攜妓登山」，¹⁴¹但攜家帶眷，遊春玩景，亦足稱樂事。

二月天氣回暖，正是春和景明的適遊時分，江南更有「二月二日為踏青節」¹⁴²之說。西虹橋、虎丘、天平、觀音上方等地方，都是遊人出遊賞春景的景點，遊山者大多先至上方謁廟，以祭拜的酒肴作為山水之遊的良伴。¹⁴³杭人則多出遊西湖，¹⁴⁴無論是山間水邊，都是「遊覽者常滿」¹⁴⁵的景象。三月三日為上巳日，民眾亦傾城而出，遊於石湖山水之間，至有「飲者、博者、交易者、閒觀者，不下萬人」的熱鬧景況。¹⁴⁶六月二十四日為荷花生日，吳地有出遊觀荷的習俗，¹⁴⁷眾人齊聚於葑門外的荷花宕，甚至以「鞋蹠不至為恥」。¹⁴⁸是日荷花盛放，吳人多操舟置酒，觀荷避暑。¹⁴⁹在顧祿的《清嘉錄》中詳實的記載了吳人踏青觀荷的情況：

舊俗，畫船蕭鼓，競於葑門外荷花蕩，觀荷納涼。今遊客皆艤舟至虎阜山濱，以應觀荷節氣。或有觀龍舟於荷花蕩者，小艇野航，依然畢集。¹⁵⁰

遠方遊客也風聞而至，欲操舟至湖中觀荷，但雇船的遊客眾多，船家準備的樓船畫舫，甚至魚鱸小艇，都被雇覓一空，遊人往往持數萬錢，也沒有辦法雇得舟船，只好徘徊岸上。湖中也是舟楫交錯之景，可見當日

¹⁴¹ 《萬曆長州縣志》，卷一，〈風俗〉，頁 6b。

¹⁴²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二，頁 6b。

¹⁴³ 《弘治吳江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卷六，〈風俗〉，頁 221。

¹⁴⁴ 《萬曆杭州府志》，卷十九，〈風俗〉，頁 16b。

¹⁴⁵ 《弘治常熟縣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出版公司，1995）史部 185 冊，卷一，〈風俗〉，頁 4a。

¹⁴⁶ 《弘治吳江志》，卷六，〈風俗〉，頁 221。

¹⁴⁷ 明·姚旅，《露書》，卷八，〈風篇上〉，頁 26b。

¹⁴⁸ 明·張岱，《陶庵夢憶》，卷一，〈葑門荷宕〉，頁 23。

¹⁴⁹ 清·黃印，《錫金識小錄》，卷一，〈備參上·風俗〉，頁 25a。

¹⁵⁰ 清·顧祿，《清嘉錄》，卷六，〈荷花蕩〉，頁 8b。

遊觀之盛。但正如張岱所言：

舟楫之勝以擠，鼓吹之勝以集，男女之勝以溷，敲暑燂爍，靡沸終日而已。¹⁵¹

可知當天景致實屬擁擠異常，賞荷悠閒之情蕩然無存。大批賞荷之人齊聚，目的是為觀荷，當時士女多以不至為恥，也反映了人們以觀荷為時尚的心態。除了荷花，時人的賞花喜好更及於梅花、牡丹等花卉，吳人在暖風入林，元墓梅花吐蕊之時，為欣賞梅花，操舟楫於虎山橋畔，夜以繼日。¹⁵²而遇牡丹花開之時，更是郡城有花之處，皆是士女遊觀的景象。¹⁵³名為賞花，實則乘機遊賞風光，偷得浮生半日閒。

夏日雖天氣炎熱，但夜晚清風徐來，頓忘炎熱，亦不啻是遊賞的佳時，¹⁵⁴因此在文人筆下常見「夏水初闊，蘇、常遊山船百十隻」、「蕭鼓士女闐駢」¹⁵⁵的描述。八月十八日的夜晚，由於當晚月亮因為光影的關係，會在寶帶橋下形成連串月影的奇景，一年一次的絕妙景致，吸引男男女女登楞伽山，競相欣賞寶帶橋下月影，也使得夏夜的楞伽山人聲鼎沸，非常熱鬧。¹⁵⁶秋高氣爽，是遊觀的好時節，九月九日，俗稱重陽節，當天民眾多登高、採菊、飲茱萸酒慶祝，¹⁵⁷蘇州人出遊治平寺，¹⁵⁸常州人或前往城郊的惠山、君山，或登城眺覽，舉榼小飲，一派悠閒，¹⁵⁹外出遊觀頗為盛行。

¹⁵¹ 明·張岱，《陶庵夢憶》，卷一，〈葑門荷宕〉，頁23。

¹⁵² 清·顧祿，《清嘉錄》，卷二，〈元墓看梅記〉，頁1a。

¹⁵³ 清·顧祿，《清嘉錄》，卷三，〈穀雨三朝看牡丹〉，頁11a。

¹⁵⁴ 明·張瀚，《松窗夢語》，卷七，頁127。

¹⁵⁵ 明·王士性，《廣志繹》，頁24。

¹⁵⁶ 《崇禎吳縣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0），第9冊，卷十，〈風俗〉，頁896。

¹⁵⁷ 《萬曆新昌縣志》，卷五，〈風俗〉，頁4b。

¹⁵⁸ 《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蘇州府部〉，115冊，頁26。

遊觀景致之多元，在好遊的江南展現的極為明顯，顧祿曾詳述其盛況說：

春暖園林，百花競放。閨人索埽花錢少許，縱人游覽。士女雜遝，羅綺如雲。……尋芳討勝之子，極意流連。隨處皆有買賣趕趁，……所在成市。游玩天平、靈巖諸山者，探古蹟、訪名勝，兜輿駿馬，絡繹於途。虎丘山下，白堤七里，彩舟畫楫，銜尾以游。……到處絞縛蘆棚，安排酒壚菜粟，以迎游冶。¹⁶⁰

春暖花開之時，士女遊觀於園林、名山勝水之中，或乘輿馬，或操舟楫，方式不同，所見的勝景不一，但相同的似是遊觀著的閒適心情。

園林，基本上乃為私人所有，但部分園林為開放性質，讓民眾有入內參觀的機會，由於園林具有「闢地廣，取徑幽，樹老雲深」的特色，入內遊賞的人有「去城市而入山林」的感受，¹⁶¹因此在明代社會上已存在「公眾性」的遊園風氣。如王暉（1447-1521）《看花述異記》中所描寫的沈家園林，原是私家別業，但因主人愛花，園中種植古桂、老梅、玉蘭、海棠、木芙蓉、牡丹等各色花卉，更疊石為山，吸引了許多遊觀者前往賞玩，「遠近士女遊觀者，日以百數」。¹⁶²祁彪佳（1602-1645）的私家園林也是遊觀的勝地，在祁氏的文集中也提到自家園林幾乎都是「遊人竟日，士女駢聯，喧聲如市」的景象。¹⁶³錢謙益（1582-1664）的拂水山莊更是當地著名的遊覽去處，錢氏對於山莊遊客眾多的情況，也

¹⁵⁹ 清·黃印，《錫金識小錄》，卷一，〈備參上·風俗〉，頁26b。

¹⁶⁰ 清·顧祿，《清嘉錄》，卷三，〈遊春玩景〉，頁7b。

¹⁶¹ 清·龔煒，《巢林筆談》（北京：中華書局，1981），卷一，〈東園〉，頁11。

¹⁶² 明·王暉，《看花述異記》，收入《筆記小說大觀》（台北：新興書局，1974）5編第6冊，卷五，頁1，總頁3377。

¹⁶³ 明·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記》，收入《祁彪佳文稿》（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山居拙錄〉，總頁1072b。

是十分困擾：

拂水遊觀之盛，莫如花時。祝釐之翁媪，踏青之士女，連袂接袂，摩肩促步。循月堤，穿水閣，笑呼喧闐，遊塵合沓，喝之不能止，避之不勝趨也。……樓既成，堤之西東，閣道相望，不能中分游者，而來者滋亦眾……。¹⁶⁴

趁花季出外踏青的遊客，齊聚於錢家的園林，而人群之眾，歡聲嘈雜，已經到了主人都不勝其擾，卻又無可奈何的程度。陳繼儒（1558-1639）也有此一困擾，他說：

士大夫志在五嶽，非絆於婚嫁，則窘於勝具勝情，於是葺園城市，以代臥遊。然通人排闥，酒人罵坐，喧笑呶詈，莫可奈何，門不能堅扃，主人翁不高枕臥，欲舍而避之寂寞之濱，莫若鄉居為甚適。¹⁶⁵

原先是爲了「以代臥遊」而建的園林，卻因爲園林已成民眾遊賞的場所，主人只得被迫接受來來往往的人潮破壞自己的清靜，即便人潮已經多到侵擾了主人的清靜，卻仍是絡繹不絕。可知遊園在明代是一股方興未艾的風潮，私家園林已成地方名勝，也有部分園主致力於修葺花木，擴大規模，以吸引遊客，如徐家的桃園：

桃園，在（上海）北郊之東北二、三里，故相徐文定公任子龍興所闢也。初北郊人傳露香園桃種，遂獲美利，于是家栽戶種，每當仲春，桃花盛開，遊人出郊玩賞，不減玄都、武陵之勝。龍興性樸務質，有圃一區，于其間雜種桃柳，中築土山，略具園林之

¹⁶⁴ 清·錢謙益，《牧齋初學集》，收於《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集部 114 冊，卷四十五，〈花信樓記〉，頁 7b。

致而已，後見遊人日盛，而林家誇多鬥靡，龍興不無起勝之意。遂即土山，增高累石，桃柳之外，廣植名花。……崇禎癸未、甲申之間，遂為一邑名勝，經營正未艾也。¹⁶⁶

由於鄰家以遊客數相誇，園主徐龍興因而大力經營「桃園」，使其「遂為一邑名勝」，可以發現在當時蔚為名勝的園林在應不在少數。在民眾已將園林視為遊觀踏青的絕佳去處的情況下，主人甚至將遊客的多寡視為攸關聲譽的要事。總之，不論是主人的喝之不止、莫可奈何，或是相互誇耀、極力經營，都反映了當時遊園已蔚然成風。

名山勝水，是外出遊觀的絕佳去處，在天高氣爽之時，各處山林、湖川都可供踏青遊賞，而蘇州的虎丘、杭州的西湖，更是聞名天下的景點。西湖之美，已見於無數文人雅士的詩文中，西湖景色相當豐富多元，可觀荷、賞月、賞雪。對於平民百姓而言，也是遊觀的勝地，如張京元的〈斷橋小記〉所言：

西湖之勝，在近；湖之易窮，亦在近，朝車暮舫，徒行緩步，人人可游，時時可游。而酒多於水，肉高於山，春時肩摩趾錯，男女雜沓，以挨簇為樂。¹⁶⁷

西湖因為「近」，而人人可遊，不論士庶老幼，或乘車或泛舟，都可以享受西湖的美景；而且四時俱有佳景，故時時可遊，春天更是男女雜遝，以「挨簇為樂」，可以想見明代西湖遊人擁擠熱鬧的情景。

虎丘由於距離都城及交通孔道不遠，加上擁有十數處古蹟，對於

¹⁶⁵ 明·陳繼儒，《晚香堂集》，〈記〉卷之四，〈許秘書園記〉，頁 20a。

¹⁶⁶ 清·葉夢珠，《閩世編》，卷十，〈居第二〉，頁 217-218。

¹⁶⁷ 明·張岱，《西湖夢尋》，卷三，〈十塘橋〉，頁 90。

四方民眾而言，無論是陸路、水路，都非常方便，也因此吸引許多遊人前往。當地人每逢歲時節令或里社釀飲之時，往往集體出遊，虎丘經常是「士女雜沓，殆無虛日」的熱鬧景致。¹⁶⁸而外地人到吳門賞遊者，也必遊虎丘，原因在於虎丘地勢不高，便於登陟，加上景致極佳：

虎丘，培塿耳，然巔可以望遠，自山趾達巔皆倚山，疊石參差，欄檻半出，樹杪有茶社、酒壚、餅肆、書攤，與郡人祠宇，甲於浮圖梵剎，間無隙地矣。¹⁶⁹

虎丘地勢雖不高，但登其山巔亦足以望遠，且疊石參差，景致絕佳，因此遊客頗眾。此一人潮齊聚之地，自是商機無窮，店家紛紛聚集，有茶社、酒壚、餅店提供吃食及休憩之地，也有書攤供耳目之娛。店家之多，種類之眾，可以想見當時遊觀之盛。另外楞伽山（又名支硎山），也因為位於城郊，又有絕妙景致，成為遊人必遊之處，二、三月間時值春暖花開之時，無論「朱樓複閣之女，騷人逸士之流，狹斜平康之伎，社男社女之兒」，¹⁷⁰皆前往遊覽，有不輸上方、虎丘等地的氣勢。

在遊觀的人潮中，也多可見婦女的蹤跡。雖然文人多認為「婦人女子謹守閨門，理之正也」，官府也極力嚴禁婦女踏出閨閣，甚至勒石示禁，明令「婦女冶容豔妝來遊此山（虎丘）者，許諸人拿送到官」¹⁷¹，但顯然成效不彰，明中期的江南地區仍是婦女好遊，「盛粧豔服，玩水遊山，畫舫香輿，朝神禮佛」的景象，¹⁷²似乎在禁令屢申及文人的貶斥

¹⁶⁸ 明·李維楨，《大泌山房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出版公司，1997），集部 152 冊，卷 127，〈虎丘僧募修塔疏〉，頁 43b。

¹⁶⁹ 清·許尚質，《釀川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出版公司，1997），集部 258 冊，卷二，〈遊虎丘記〉，頁 22b-23a。

¹⁷⁰ 明·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卷八，〈楞伽〉，頁 9b。

¹⁷¹ 王國平、唐立行主編，《明清以來蘇州社會史碑刻集》（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1998），〈蘇州府示禁挾妓游山碑〉，頁 565。

¹⁷² 明·黃六鴻，《福惠全書》，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聲中，婦女踏青遊觀的盛況並未稍減。

江南地區風光明媚，山水園亭多於他地，因而「吳俗士女多出遊」，在春暖花開，秋高氣爽的時節中，無分士庶男女，或流連於奇花異卉間，或徜徉於私家園林與名山勝水之中。是時遊風之盛，由江南各地方志屢屢出現遊觀活動記載可見一斑，不需多花錢財，只消天氣和暖，便可前往城郊或勝地「尋芳問柳」，到處是遊人雜遝、士女駢聯，這種積極享樂於遊觀之中的景象，實有其特殊的文化意涵，值得玩味。

小結

明代中期以後，遊觀蔚然成風，百姓紛往山水名勝、私家園林野遊踏青，或賞花，或泛舟，呈現遊觀場所的高度密集性，也因此針對吳人好游之情況，袁中郎有「中秋無月虎丘山，重陽有雨治平寺之謔」，¹⁷³中秋齊聚虎丘、重陽朝會於治平寺，即使無月色之美，或大雨傾盆，都不減遊興。除了野遊之外，平民百姓更利用歲時節令，以進行特定的活動為名，而遂遊觀之實。基於對神鬼的的敬畏，庶民更是定期前往寺觀之中燒香祈福，著名神祇的誕辰之時，更是男女老少齊聚寺觀，而伴隨遊人聚集而興盛的廟會活動，則增添了百姓遊賞的趣味性，讓民眾在完成宗教想望之時，也能夠享受演劇、雜耍等耳目之娛。而神明巡遊為慶典的主要部分，民眾或直接參與巡遊、扮裝，或以旁觀者的角色在旁執香、圍觀，進行充滿熱鬧、遊戲氣息的巡遊，獲得了心靈及行為上的解放。此外，長程的朝山或進香，更為百姓提供了遠遊的機會，得以飽覽他地風光。

第3輯19冊，卷三十一，〈庶政部〉，頁11a。

¹⁷³ 明·徐樹丕，《識小錄》，收入《筆記小說大觀》40編第3冊（臺北：新興書局，

明代文士將遊觀視爲正經事，及適情適意的人生大事，坦言好遊，並以爲癖好，與歷代文人大相逕庭。文人的遊觀方式及去處不同於平民百姓，多喜人煙稀少之處，強調觀景，希望不受干擾，並以到達旁人無從觸及的絕地爲高，即便前往著名的風景名勝，也多喜避開平民百姓觀景的時間，選擇特出的景致賞遊，並於遊記中強調自己遊觀的特殊性，更希望能夠登臨具有高度挑戰性的崇山峻嶺，冒險色彩極爲濃厚。外出遊觀、欣賞山水之美，在文人中形成一股風氣，賞花、觀月等被視爲遊觀活動中的重要部分，對於無法親臨其境的文士而言，或築園池於平居之中盡享山水美景，則或以遊記丹青爲本，進行臥遊，藉由想像讓自己徜徉於山水之中，感知山川之美。

從庶民的遊觀活動中，可以發現平民旅遊往往偏重特定風景名勝，特定時節，取其擁擠、看人的熱鬧景致，以挨簇爲樂，以至爲恥。而文士則是特別強調己身遊觀意境與庶民的差異性，以爲唯獨文士可以感知山水真趣，遊賞地點以奇險爲高，以人煙罕至爲佳，並以不言好遊爲怪，暢言恣遊山水之樂。在這種重視山水美景的遊觀風氣下，文人注意到可資勝遊者不只是山水，遊覽處的風土民情亦可以是賞遊的一部份，這樣特殊的人文關懷，爲單純的山水賞遊加入了專屬於明代士人遊觀的特色。